



清帝國性質 的再商榷

回應新清史

汪榮祖 主編



〔人文研究叢書之2〕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 ——回應新清史

汪榮祖◎主編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 遠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汪榮祖主編。
—初版。—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
遠流，2014.08
面；公分
ISBN 978-986-5659-00-4（平裝）

1. 清史 2. 文集

627.07 103013310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主編：汪榮祖

執行編輯：許家泰

編輯協力：簡玉欣

出版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國鼎圖書資料館 3 樓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發行單位／展售處：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電話：(02) 23926899 傳真：(02) 23926658

劃撥帳號：0189456-1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2014 年 8 月 初版一刷

2014 年 10 月 初版二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新台幣 300 元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5659-00-4（平裝）

GPN 1010301304



遠流出版集團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目次

導論 / 汪榮祖	5
一、以公心評新清史 / 汪榮祖	23
二、新清史與南北文化觀 / 楊念群	57
三、清朝的戰略防衛有異於近代帝國的殖民擴張 ——兼論英文中國史學界中「歐亞大陸相似論」和「阿爾泰學派」 / 吳啟訥	81
四、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 甘德星	109
五、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 ——兼談清朝的漢化 / 崔岩	115
六、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代價 ——以八旗子弟的教育為例 / 葉高樹	133
七、晚清時期滿族的國家認同 / 定宜莊	165
八、論何炳棣撰〈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 / 徐泓	193
引用書目	201

〔人文研究叢書之2〕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 ——回應新清史

汪榮祖◎主編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遠流

目次

導論 / 汪榮祖	5
一、以公心評新清史 / 汪榮祖	23
二、新清史與南北文化觀 / 楊念群	57
三、清朝的戰略防衛有異於近代帝國的殖民擴張 ——兼論英文中國史學界中「歐亞大陸相似論」和「阿爾泰學派」 / 吳啟訥	81
四、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 甘德星	109
五、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 ——兼談清朝的漢化 / 崔岩	115
六、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代價 ——以八旗子弟的教育為例 / 葉高樹	133
七、晚清時期滿族的國家認同 / 定宜莊	165
八、論何炳棣撰〈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 / 徐泓	193
引用書目	201

導論

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創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體。秦祚雖短，然秦制綿延悠長，中華帝國自秦至清延續了兩千餘年，朝代雖屢變，而政體少異，雖時而分裂，終歸於一統。事實上，中華專制政體愈演愈烈，至明、清兩代而極盛。大清為中華帝國史上不可分隔的朝代，何從質疑？然而近年來流行於美國的所謂「新清史」，否認大清為中國的朝代，否認滿族漢化之事實，而認為滿人有其民族國家之認同，清帝國乃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而已，而最顛倒之論，莫過於指責滿清為中國朝代之說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產物。就此而論，將漢化與現代民族主義聯結在一起，豈不就是新清史的建構？難道魏文帝漢化的事實也是現代民族主義的建構？若此說能夠成立，不啻是對中國歷史的大翻案。翻案或有助於歷史真相之發掘，然能否成立主要有賴於新史料的出土，或新理論的出臺。新清史雖強調新史料，然無非是滿文舊檔；滿檔既非新出，也不足以支撐翻案。至於理論，無論「歐亞大陸相似論」或「阿爾泰學派」之說，皆屬一偏之見，也難以支撐翻案。歷史學者如果不願意盲從新說，則必須有所回應，表達不同的意見。

臺灣的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於2012年之秋，約集了兩岸清史學者十餘人，就清帝國性質議題舉行了研討會，並發表專題論

文。本書八篇文章從不同角度討論清帝國的性質，都曾在研討會上提出討論，經會後修訂而成。我們不僅要回應新清史的論述，更願意引發對此議題更普遍、更深入的研討。本書應可供眾多讀者們的參考。

拙撰〈以公心評新清史〉，先列舉新清史論述的要點，接著從何炳棣教授的維護漢化論說起，指出何教授的反駁及其對漢化所作的四點結論，皆有據有理。他深信漢化在中國歷史上有其至高無上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強烈回應並未得到挑戰者應有的答覆。既然依何教授所說，中國原是一多民族的國家，所謂漢化實際上是以前多數漢族與統稱為胡人的少數民族的融合過程，不僅僅是胡人漢化，也有漢人胡化。漢民族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吸納非漢族文化與血緣，而形成中華民族，所以章太炎稱中國民族為一「歷史民族」，即指經由歷史過程而形成者。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由胡人建立的諸多政權之一，卻是最成功的朝代，殊不能自外於中國。然則漢人已不能等同中國人，中華民族亦非僅漢族；所謂「漢化」，實際上是「中國化」，中國是統一之稱，而「漢」乃對稱。

滿族入主中原後所締造的中亞帝國乃中原之延伸，中原與中亞既非對等的實體，也非可以分隔的兩區，更不能與近代西方帝國由母國向外拓張與殖民，相提並論。建都於北京的清帝莫不以合法的中國君主自居，政權亦非僅在滿人之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也不能由族性來劃分，然則新清史的「族性主權」（ethnic sovereignty）論述，也難以成立。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不能把

族性認同與國家認同混為一談。被認為是維持滿洲族性認同與大清統治的八旗制度，其實此制包含的屬人不僅僅是滿人，也包括其他族群，只認同旗主，並不認同族群，是一種君臣之間的封建關係。然而當清朝成為大一統的帝國之後，八旗制就難以適應，主要是因為皇權至上，不再允許認同旗主。至雍正朝更明顯要清除「各旗主屬的名分」。不是有意要違背祖訓，無奈八旗共治、八王議政，與推選制度都不合中央集權體制，還是需要中華帝制與儒教名分來穩固現狀。在此現狀之下，無論滿、漢，或其他少數族群，所認同的就是承襲中華帝制的大清國，而不是各個族群。各族群自有其族性認同，與國家認同並不是二選一的習題，所以包括八旗制度在內的所謂「滿族特色」也不至於改變中央集權的本質。乾隆皇帝自稱是中國正統之繼承者，並強調大一統政權就是「為中華之主」，也就不足為異了。就國家認同而言，在清朝存在時，各族認同朝廷；民國成立之後，則認同以五族為主的共和國。中華民族名詞雖新，然其形成實來自九千年的交融史，具有多元性格，多元王朝絕非僅自滿族建立的清朝始。所以拙文的結論是，滿清帝國乃中華帝國之延續，應毋庸質疑。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楊念群教授提出〈新清史與南北文化觀〉一文，從地理文化觀點來評論新清史「以滿洲為中心再度定義中國」的史觀。新清史此一論述基本上以東北到內亞為主軸，以挑戰從江南到北方為基線的、以儒家思想為皇朝統治核心的論述。以東北到內亞為主軸之說，強調大清國土的擴張來自長城以外，統一中國則由於「滿蒙同盟」起了關鍵作用。楊教授指

出，我們不能「混淆領土拓展與政治治理之間的區別」。換言之，領土的拓展若無統治能力，仍然無濟於事，清帝國延續近三百年的統治如果沒有「南北主軸」的支撐，豈能想像？更何況按照何炳棣教授所說，大清能夠向西拓展實亦有賴於中原的實力。楊教授指出，「滿蒙同盟」只能說是關鍵之一，當然不能視為「清朝統治的唯一基礎」。眾所周知，漢人降將如吳三桂、洪承疇等對滿清統一中國，難道不夠關鍵嗎？晚清曾、李、左平定太平天國，難道不是清朝統治的基石嗎？

新清史的論述刻意要貶低儒家禮儀作為清帝統治最重要的手段，但楊教授指出：與儒家禮儀相比，如薩滿教和藏傳佛教所能起的作用，完全無法發揮與儒教同樣的功能，甚且薩滿教禮儀不斷在衰落與消失之中。相反的，清帝採用漢家祭典儀式卻愈來愈頻繁。楊教授希望能夠結合「東北／內亞」與「南／北」雙重歷史視野，以達到「合璧的解釋效果」。

楊教授也不能苟同「漢化論」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清朝固然不是近代民族國家，但「漢化論」卻不是後起的。楊教授也指出，滿人特性在近代以來的快速消失，正好反證了「漢化並非完全是一種話語建構」。新清史把清朝從中國歷代王朝中區分出來，說是大清帝國不能等同中國，中國只是清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楊教授認為是一種非常極端的說法，不免又以「東北／內亞」史觀來否定「南／北」史觀。同一史觀又挑戰將西北邊疆視為中原與江南邊緣地帶的論述，認為清朝的統治根基實以控制西北為主軸，以蒙古、西藏、東北、新疆為核心，中原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楊教授認為這種史觀不僅忽視了清朝無論在價值觀上或正統構建上與前朝的承續關係，而且也無視以中原／江南為中心的統治策略，「頗有悖於歷史解釋的完整性」。從乾隆明示清朝應延續宋、元、明正統，而不是與遼、金銜接，更可以為證。

楊教授認為「東北／內亞」文化觀崇尚大一統，與強調正統的「中原／江南」文化觀，一直存在著緊張關係。事實上，正統觀若能破除夷夏之分，反而有助於大一統之治，雍正、乾隆兩帝崇尚儒家正統，亟言無分滿漢，即此用意。誠如楊教授所言，直到清末，革命黨為了推翻滿清，喊出「驅除韃虜」的口號，不惜針對滿族發動「種族革命」，無意中自限於「中原／江南」的建國模式。但是當塵埃落定，革命黨人還是主張五族共和，並不願意放棄東北／內亞的疆域。楊教授提到，有學者發現經過清帝遜位的儀式和遜位詔書的頒布，才使民國正式繼承了清朝的大一統的疆域。此一發現，很有意思，至少民國繼承清朝在法理上有所依據；不過，歷史經驗顯示，能否有效繼承還得依靠國力。

吳啟訥博士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治邊疆史有成，他提出〈清朝的戰略防衛有異於近代帝國的殖民擴張〉一文，從題目可知，作者要說明的是，清帝國的西進與近代西方的殖民擴張，在性質上並不相同。他特別要說明這一點，因為近年出版有關中國的英文著作中，提出所謂「歐亞大陸相似論」（Eurasian Similarity Thesis）和「阿爾泰學派」（Altaic School）；前者主張在十八世紀之前，清帝國像俄羅斯帝國一樣是近代擴張

帝國，瓜分了中亞，而後者則強調清帝國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實施的殖民主義，與其他殖民帝國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兩種理論殊途同歸於清帝國乃屬歐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的推論。吳博士特別提到美國學者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近著《中國西進：大清征服中亞記》（*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將清朝征服準噶爾，置伊犁將軍府，使新疆、蒙古、西藏均收入版圖，等同十七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拓展。濮氏將清帝國抬高到歐洲列強的層次之餘，無非旨在批判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批評將現代中國視為清帝國的當然繼承者乃昧於清帝國的殖民擴張史之論。吳博士不同意此說，指出包括俄國人在內的西方學者，昧於東亞政治秩序以及經濟上的依賴，所以不能了解滿清與蒙古之間的「密切」關係，以至於認為清朝既然與俄國一樣征服中亞的其他獨立政權，如何親善？故認為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行為。更重要的是，俄國在中亞並無安全顧慮，而清朝則有之。準噶爾汗國不僅與俄國聯盟，而且攻打喀爾喀蒙古、介入達賴喇嘛的轉世，嚴重挑戰清帝國的安全與在西藏的合法地位。

滿清帝國的擴張與統治與近代資本主義帝國的殖民擴張，差異在哪裡呢？吳博士指出，西方列強以武力奪取殖民地，任命總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勞力與市場，並灌輸其宗教與文化價值，且有意壓制自主意識。而清朝擴張後的統治，僅求納貢與形式上的臣服，不作直接統治，與俄國在中亞侵佔和掠奪，差異極大。最大的差異是，即使伊犁將軍府設立後，清朝在新疆以屯田

的方式自籌軍需，不僅未曾從新疆榨取任何經濟利益，而且還動員各省補貼新疆財政與軍需，最主要的資助來自所謂「協餉」。吳博士告訴我們，在新疆設立的伊犁將軍府實際上具有相當意義的自治。而這種制度並非滿清的創建，直可追溯到漢唐帝國。如乾隆帝所說，軍府制作為軍政合一的行政管理體制，乃是參酌前代治邊得失與本朝慣例而制定的。清朝在邊疆也很能因地制宜，建立起不同的民族管理系統，避免直接統治，更不干預當地人的社會與文化生活。這顯然與西方或俄國殖民統治是絕然異趣的，所以西方學者視軍府與屯田為軍事殖民，是不求深解的錯誤判斷。吳博士也告訴我們，清帝國在蒙古與西藏地區僅有象徵性的駐軍；在新疆的駐軍也不以高壓統治為後盾。因為清帝國的戰略目標，依然承襲二千年來中原王朝的傳統，以保障農業地區的安全為主，仍不脫傳統中國的保守與防禦性質。吳博士充沛的邊疆史知識有力地駁斥了新清史切隔中亞與中原之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吳博士所說清朝征服準噶爾後，新疆沿邊以及中亞等部曾相繼上表清廷，要求內附，但乾隆皇帝拒絕了這些政權的要求，而是將之視同與朝鮮、安南一樣的「宗藩」關係，實行傳統中國的羈縻政策，除名義上的加封外，不設官置守，也不干涉內部事務，更不介入各部之間的紛爭。清帝國但求中亞各藩部「能約束所部，永守邊界，不生事端」。當十八世紀俄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清廷也置之不理，甚至自願將哈薩克和布魯特劃出界外。到了十九世紀，清朝在沿邊設置的卡倫和巡查路線，一再向後退縮，以至於國土淪喪。如此保守的防禦心態，

如何可能與西方或俄國那種無限度追求民族國家利益的殖民政策相提並論呢？

吳博士的結論是，滿人入關後定都北京，就命定成為中國的朝代，清帝一心要當中國的合法皇帝，所制定的邊疆政策也承襲前朝，參照漢唐帝國間接統治西域的模式，根本無法如「阿爾泰」學派所說，保持「滿洲特色」。這不僅僅是滿清的邊疆政策，二十世紀的中國領導人如蔣介石、毛澤東，在處理邊疆事務上，同樣缺乏近代殖民主義的意識。現代中國作為一多民族的國家，仍然延續了傳統帝國的意識，使立足於西方歷史經驗的蘇聯、俄國和當代歐美學界，難以理解。吳博士同時對「阿爾泰」學派與「歐亞大陸相似論」因現代中國未能回到明朝版圖而致憾，不得不懷疑這兩派學者立論的政治動機。

執教於嘉義中正大學的甘德星教授是滿文與清史專家，他提出〈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一文，以康熙皇帝為例，駁斥滿清皇帝不是中國皇帝的說法。他所用四份康熙遺詔，有漢文本，也有滿文本，先鑑定版本，然後指出遺詔的重要性，可說是國家權力轉移的關鍵文書。遺詔先寫漢文，後寫滿文；但宣讀遺詔時，則先宣滿文，後宣漢文，顯示滿漢一體意識。從遺詔內容可知，康熙自稱是中國皇帝，滿文譯本亦不作「汗」（xan），而作「皇帝」（xôwangdi），他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他所統治的都是「中國之人」。甘教授指出遺詔正本沒有蒙文本，使我們更能確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內亞。清帝設立理藩院處理邊疆事務，甘教授從滿文、

蒙文、藏文對譯中發現都有「外」意，認為無疑視為邊地，「宜乎漢文稱之為藩也」。

甘教授進一步引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與《尼布楚條約》滿文本，來印證康熙遺詔所呈現的中國觀，不僅康熙自稱是中國至聖皇帝，俄國人也視大清為中國。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遺詔中，自稱繼承明朝的中國正統，並以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為榮。甘教授提醒我們，康熙在遺詔中一再引用漢典，將「滿清納入中國王朝的歷史系譜之內」，而沒有引用遼金元史實，認為康熙「欲擺脫內陸歐亞之糾纏，至為明顯」。同時可以證明，滿清在康熙時，漢化已深，「滿漢已成一體，並同為中國之人」。這句話足證，在康熙大帝的心目中，中國此一概念一點也不含糊。甘教授的結論是，「新清史」所謂大清非中國之說，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國，其重心在關內漢地，康熙是以漢地為中心的中國之主，並非以中亞為軸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順治與之後的雍正、乾隆諸帝，亦復如此。

執教於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崔岩博士研究乾隆詩多年，她提出〈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兼談清朝的漢化〉一文，從乾隆一生所做的四萬多首漢詩入手，探討乾隆對漢文化的態度，以及漢文化對清帝與清帝國的影響。她指出，乾隆沉湎於漢詩，做了洋洋大觀的漢詩，於十八世紀國力鼎盛時期，詩作尤多。詩作如是之多，除了下筆快速，勤於寫作之外，顯然是這位清帝「愛好漢詩成癖」。崔博士因而認為，乾隆沉醉於吟詠，不能自拔，可見這位清帝涵泳中華歌詩之深，並藉漢詩表達內心的